

秦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对秦汉人口问题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秦汉社会特有的本质,审视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基本线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秦汉人口分布与迁徙作一初步讨论。

中国自西汉始,才有具体户口统计数字。《汉书·地理志》载:“迨至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这是第一次史籍明载的全国户口统计数字。秦统一以前全国户口统计的具体数字不甚清楚,只是在《帝王世纪》一书中有初步推测。《帝王世纪》是晋人皇甫谧所作,已失传。南朝刘昭在给《后汉书》作注时,曾引用此书有关各朝户口统计的数字。《帝王世纪》云:“然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万余,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对秦统一前后人口数,皇甫氏主张以全国总兵力推之。一般认为,皇甫氏的推算有两个问题。其一,苏秦、张仪所言为纵横家之论,夸张成份较大,不足为凭,故以其言统计出“戎卒尚存五百万”的结论,应打折扣。其二,以戎卒五百万,推算出千余万总人口,可知皇甫氏依据的口户比为1:3左右。但是当时口户比应高于1:3。汉代口户比约为1:4.5左右。先秦社会受宗法制影响较深,口户比应比汉代高。《周礼·小司徒》说每户平均6人;《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言,应为“一夫挟五口”;而《管子·揆度篇》则称每户10人;《孟子·尽心篇》又有每户8人之说。如果按照《周礼》口户1:6之比,全国人口总数应达到三千万左右。

秦汉时期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

孙
筱

现在,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秦统一前,七国相加总兵力为五百万是可信的。秦末统一战争极其残酷,仅以《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在始皇继位前短短20年间,共发生近20次有大规模斩首记录的战争。秦兵斩首约二百万,这其中包括秦兵自损人数和六国互相攻伐伤亡人数。如果加上战争幸存兵员,那么,秦始皇继位前,七国总兵力为五百万不为多。第二,皇甫氏在以兵数推算人口总数时,并不是严格按照1:3的口户比。先秦官私畜奴婢比较盛行。奴婢一般由国家和主人控制,无独立门户。从军奴隶先秦兵卒中占较大比例。史籍所载的苍头、厮徒之类就是从军奴隶的专称。由于奴隶多为单身,因此奴隶从军就降低了当时全国的口户之比。另外,由于秦末统一战争时各国都要进行全国范围总动员,竭尽其兵源,故平时一户一

兵的情况在这种非常时期已不太可能。这一点在以兵卒推算人口总数时应予以考虑。因此,我们可以说,皇甫氏推算秦代人口“尚当千余万”是有道理的。此外,皇甫氏谈到其它朝代口数时均列出具体数字,唯独秦时的口数,只说一个大约数,可见并非姑妄之言。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秦统一前全国总人口大概为一千余万。可能高出一千五百万,低于二千万。

秦末汉初,因全国性战乱,人口有大量减少。关于汉初人口总数,《汉书》中未提及。《汉书》所提到的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数。《帝王世纪》同样提供了元始二年人口数,户数是13 233 612,口数是59 194 978。其数字与《汉书》略同,可能来

源于同一个资料,也可能抄自《汉书》。《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户数为13 233 062,口数是59 594 978。而将该志所列的103个郡国户口相加,共计户数12 366 470,口数57 671 401。这种前后不符的问题,究竟是《汉书》作者加错了,还是后人抄错了,已不得而知。此外,《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共计1 587;而将其上所列的县道邑侯国数逐一相加为1 577,二者相差10个县道。这是《汉书》依赖不同资料造成的,还是别有原因?

实际上对以上三项具体数字的考订并无很大必要。这不但因为历史人口统计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而且,这三个数字相差并不大。汉代人口亦应包括被视为四夷的少数民族人口。根据史料记载,汉代四夷人口在西汉后期接近二百万人。^①这就是说,西汉人口最高时达到6 000万人。东汉有关各年代人口总数记载颇多,其中《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全国户为9 698 630,口为49 150 220,较可信。

二

我们再对汉代人口分布作一探讨。

在先秦时代,人口以黄河中下游为聚集中心,向外幅射。到了秦建国前后,这种情况仍未改变。由于秦国人口密度比关东低,因此秦通过招募邻国移民办法来改变既成的人口分布状况。秦王朝统一后维持的时间不长,她所进行的人口迁移并未改变既存的人口分布情形。到了西汉,人口分布仍以黄河中下游为集聚中心。汉代史籍不仅有全国总人口数字,而且对各郡国的人口亦有交待。由此为我们研究汉代人口分布状况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书·地理志》提供了各郡国人口数字。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末年人口分布仍极不平衡。人口最多的郡国是汝南、颍川,其数量均超过二百万;超过一百万的郡国,按

名次排列分别是南阳、河南、东郡、东海、陈留、济阴、蜀郡、临淮、琅琊、河内。这些郡国除蜀郡外,皆位于关东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黄淮之间。蜀郡虽然人口较多,但其土地面积较大,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超过2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济阴郡,每平方公里达260余人;其次是留川国,接近25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百人的,按名次排列分别是颍川、真定、高密、鲁国、东平、北海、齐郡、河南、陈留、东郡、千乘。这些郡国亦多位于关东。在今河南、山东两省境内共有40多个郡国,生活着2 500万余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40%。其次人口较密集的是今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等地。人口达2 0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33%。其余人口生活在今甘肃、四川、湖北、广东、云南各省。这些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较低。其中位于今广西东部的郁林郡,人口仅7万余人,每平方公里只合0.5人。

史籍留下的东汉资料渐多,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人口分布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东汉两百年间共有12个年代的全国人口数^②。现依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全国人口总数,推算东汉中后期人口分布的基本状况。

东汉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地区,总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5%左右,较西汉有所下降。今河北、山西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15%左右。其中河北人口下降不大,而山西人口则下降一倍以上。今安徽、江苏人口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今浙江、江西一带的人口比西汉有较大增长,约占全国总人口5%。其中江西人口增长近5倍。今湖北、湖南人口占全国人口8%左右,比西汉增长较大。其中湖北略有增长,湖南人口比西汉增加4.5倍左右。今福建、广东、广西、

^① 根据《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南夷传》统计。

^② 见《后汉书·郡国志》及刘昭注引伏无忌所记。

《晋书·地理志》又提供了桓帝永寿三年人口数。

云南等南方地区人口均有较大增长。长江流域及以南包括今四川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40%余,而在西汉则不到25%。关中地区人口亦有下降,东北各地基本未变。

与西汉相比,东汉人口分布已有改变,南方人口有较大增长。但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仍集中在关东。该区内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百人以上的州县比比皆是;而其它地区如南方,虽然人口有所增加,但由于地域面积大,每平方公里仍不足一人。因东汉建都洛阳,所以关中地区人口下降十分明显。长江流域人口有较大增长,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而江北人口呈下降趋势。东汉南方人口增长原因很多。东汉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常处于混乱状态。北方受此影响更大。同时,北方受与少数民族战争的影响也较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破坏。所以人口逐渐南移,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减少。另外,东汉平均气温比西汉低^①,这必然会给以农业为主的北方地区带来困难,自然灾害增加,导致人口增长速度降低。而在南方,温度适当下降,则更适宜农业生产。

三

造成秦汉人口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人口迁徙。在当时,人口迁徙可分为自然性人口迁徙和强制性人口迁徙。前者指人民由于某些原因背弃家乡,迁移到更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后者指政府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的而强制人口迁移。

自然性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是迁移者原生活地区发生水灾、旱灾、虫灾、战乱等,使百姓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秦朝维持时间不长,自然性人口迁徙在史籍上反映较少。在两汉,人口自然迁徙则很普遍。《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大灾,“民就食巴蜀”。汉代视自然迁徙人口为流民。汉代虽有严格的户籍制度,防止人口脱籍流动,但在某些天灾人祸年份,却无法执行。为了把这些流动

人口重新纳入户籍便于控制,汉官府往往采取让流民自占著籍办法,重新予以登记。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前19年),关东地区水旱为灾,成帝下诏曰:“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亡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②东汉时期,社会动荡,流民渐多。人口自然流动同样又是造成社会秩序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对其控制方法是否得当,几乎直接影响到一个朝代的盛衰。

强制性人口迁徙在秦汉时期较多。秦国移民,自商鞅变法已开始。当时秦国人口密度比关东各国低,招募移民是增强国力的有效手段。在秦统一战争前后,秦进行了一系列强制性人口迁徙,其主要目的是实关中和垦荒。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③;这次人口迁徙是为了加强京师,并借以控制割据分裂势力。这十二万户,按每户5~6口计,近70万人。可见此次迁移应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三十五年(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④。丽邑是始皇陵墓所在地^⑤。以上两次人口迁移目的是为了实关中。

除了迁移人口实关中外,秦朝亦向边疆新开发地区迁移人口。如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三万家”。^⑥秦发七科谪籍者徙边是最常用的办法。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⑦

西汉时期,史籍明载的强制性人口迁徙则更多。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之父“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⑧;高祖

① 见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② 《汉书·成帝纪》。

③④⑤⑥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汉书·高帝纪》十一年注引应劭说。

九年(前198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①按《汉书》记载，上述五姓迁关中者计10万余口。惠帝时，“徙关中倡优乐人五千户为陵邑”^②。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这是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徙民实边。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中连年水灾，“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③这次迁徙口数达七十二万五千口^④。

《汉书·成帝纪》载：嘉鸿三年(前20年)，“徙郡国豪杰訾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平帝时，王莽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⑤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常关、居庸关以东。”^⑥明帝永平九年(66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⑦

《后汉书·桓帝纪》亦载：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根据《汉书》和《后汉书》各帝纪记载，两汉时人口迁徙近40次，可分为实关中、实陵、实边三大类型。其中以实关中为目的的人口迁徙共3次，均在西汉初年；以实陵为目的的人口迁徙计10次，多在西汉；其它多为实边。在近40次人口迁徙中，有人数记载的共8次，人数多至70余万、少至数千口不等。

西汉初年，关中地区人口较少，豪强旧族多集关东，对地方政治形成威胁。汉高祖采取刘敬“强干弱枝”的建议，从关东移民实关中。这项政策完全符合新建王朝的现实与长远利益，正如刘敬所言：这些移民“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实也。”^⑧上面列举的西汉初年几次人口迁移，在当时人口基数较小的背景下，应是

比较大的。至汉文帝时，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大批移民迁入关中，加上刘氏政权机构的庞大，造成关中地区人口，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口膨胀，使粮食供给发生困难。文帝不得不下诏疏散关中非生产性人口，“其令列侯之国，”并免除丞相周勃之职，让其带头就国。”^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政府又废除关禁^⑩，允许百姓出关入关。但到景帝时，出现吴楚七国之乱。为了防止这类反叛再次发生，景帝继续采取“实关中”政策，并恢复了关禁。这项措施遂为西汉各朝所继承。在西汉初年，“实关中”和“实陵”的目的是一致的，以实陵来达到实关中的目的，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削弱关东地区诸侯势力，并为中央政府提供大量可以迅速利用的兵役资源。移民关中，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为了减轻关东地区人口压力，合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有利于关中、关东两地经济发展。西汉后期，由于地方诸侯势力已被严重削弱，关东地区人口向南方有大批自然性迁移，所以后来实陵已脱离“实关中”目的，成为纯粹的实陵了。而实陵给汉政府造成巨大财政压力，以至后来有罢陵之议。^⑪

东汉建都关东，关东人口本来就十分稠密，毋须象西汉那样迁徙人口。因此，东汉时期大规模强制性人口迁徙较少。

募民徙边是两汉强制性人口迁徙的另一种类型，其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内地侵扰。西汉时，匈奴是汉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防御对象，故徙边之民多安置在

① 《汉书·地理志》，参见《汉书·高帝纪》、《汉书·刘敬传》等。

② 《关中记》。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王莽传》。

⑤ 《后汉书·光武帝纪》及《吴汉传》。

⑥ 《后汉书·明帝纪》。

⑦ 《汉书·刘敬传》。

⑧⑨ 《汉书·文帝纪》。

⑩ 《汉书·韦玄成传》。

北部和西北部。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①后又在西部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都是为了安置从内地来的移民。除募民徙边外，汉还在边疆地区建立屯田。西汉中期，曾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②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形式，其中军屯是由戍卒定期轮换，戍卒不是完整意义的移民。东汉时，匈奴内侵的威胁大大减小。东汉向北部、西北的移民也不如西汉规模大。东汉王朝常用罪犯实边，尽管这类实边次数很多，但人数毕竟有限。

少数民族内迁在两汉时亦颇多。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率四万余人降汉，汉武帝“乃分处降者于五边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③汉政府把降汉的匈奴人安置在边郡地区，直接促进了匈奴和汉民

族的文化交流。对西北地区的羌人，汉政权亦采取同样办法。宣帝时，羌人反叛被平息后，汉政府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④。南方地区越人内迁在先秦时已开始。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⑤迁移江淮之间的越人，很快被人数占优势的汉族居民融合。越人擅长水田作业，移民在与当地居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融合后，推动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①② 《汉书·武帝纪》。

③ 《汉书·卫青传》。

④ 《汉书·赵充国传》。

⑤ 《汉书·闽粤王传》。

· 动态 ·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 人口专业委员会成立

1992年4月4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及大专院校人口所等单位的中国人口学者、专家，在航空航天部710所举行了人口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人口专业委员会是隶属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的专业学术团体，专门研究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采取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系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致力于中国现实人口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的系统研究，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袂进行人口软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为探索中国人口控制机制和生育率的转变，建立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新机制，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会议通过专业委员会章程，选举了由36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和由22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大会选举了马宾、蒋正华为本会理事长，于景元、孔德涌、肖振禹、陈胜利、邹平为付理事长，于景元、杨子慧、魏津生为秘书长。

邹平同志作了“关于人口与发展理论的研究与探讨”、陈胜利同志作了“人口专业委员会未来方向浅议”专题发言。新当选为本会理事长的蒋正华同志作了发言，他说，现在正式成立人口专业委员会，把致立于人口研究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可以更好地进行探讨和研究人口方面的新课题，当今世界上许多新的成果都出自于交叉和边缘学科，把交叉科学的系统方法运用于人口理论和政策研究，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他还说，人口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人口系统是一个大的复合系统，要在研究中注意把经济发展、文化与计划生育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把国际经济与人口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趋势结合起来研究，使人口问题的研究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得更大成绩。

（航空航天部710所 王丽莉供稿）